

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莫言
作品系列



莫言
◎著

酒国

在浪漫多情，
混乱腐败的年代里，
弟兄们，
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

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莫言

作品系列



酒国

莫言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酒国/莫言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10(2012. 10 重印)

ISBN 978-7-5321-4630-7

I . ①酒… II .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2818 号

出 品 人：陈 征
策 划：曹元勇
责任编辑：吕 晨
封面设计：钱 祯
封面绘画：Jenny

酒 国

莫 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287,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5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30-7/I · 3608 定价：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26000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代序言

莫言

大约是两年前,《长篇小说选刊》创刊,让我写几句话,推辞不过,斗胆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剽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这如同战争中,有的人,指挥一个团,可能非常出色,但给他一个军,一个兵团,就乱了阵脚。将才就是将才,帅才就是帅才,而帅才大都不是从行伍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写长篇小说的称作帅才,更不敢把写短篇小说的贬为将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请原谅。

一个善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

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许多伟大的长篇小说作者，一开始上手就是长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罗贯中等。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砺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只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近几年来，“悲悯情怀”已成时髦话语，就像前几年“终极关怀”成为时髦话语一样。我自然也知道悲悯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你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边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负恶名，但有见地的批评家却说那是一部悲悯之书。这才是中国式的悲悯，这才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基础上的悲悯。长篇小说是包罗万象的庞大文体，这里边有羊羔也有小鸟，有狮子也有鳄鱼。你不能因为狮子吃了羊羔或者鳄鱼吞了小鸟就说它们不悲悯。你不能因为它们捕杀猎物时展现了高度技巧、获得猎物时喜气洋洋就说他们残忍。只有羊羔和小鸟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说不是小说。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鸟，也要吃昆虫；即便是好人，也有恶念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描写政治、战争、灾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带给人的苦难,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让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是煽情催泪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悯,更不是大悲悯。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关于悲悯的话题,本该就此打住,但总觉言犹未尽。请允许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报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总编辑退休之后在自家报纸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许会使我们对悲悯问题有新的认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难忘的毙敌场面》,全文如下:

中外古今的战争都是残酷的。在激烈斗争的战场上讲人道主义,全属书生之谈。特别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下面讲述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毙敌场面,也许会使和平时期的年轻人,听后毛骨悚然,但在当年,我却以平常的心态对待。然而,这个记忆,仍使我毕生难忘。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顽军152师所属一个大队,瞅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北支”驻地大镇等处发动疯狂进攻,我军被迫后撤到驻地附近山上。后撤前,我军将大镇潜伏的顽军侦察员(即国民党特务)四人抓走。其中有个特务是以当地医生的面目出现的。抓走时,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们知道我军撤走的路线),同时绑着双手,还用一条草绳把四个家伙“串”起来走路。由于敌情紧急,四面受敌,还要被迫背着这四个活包袱蹒跚行进,万一双方交火,这四个“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队长邬强当即示意大队长郑伟灵,把他们统统

处决。

郑伟灵考虑到枪毙他们，一来浪费子弹，二来会惊动附近敌人，便决定用刺刀全部把他们捅死。但这是很费力，也是极其残酷的。但在郑伟灵眼里看来，也不过是个“小儿科”。当部队撤到英德东乡同乐街西南面的山边时，他先呼喝第一个蒙面的敌特俯卧地上，然后用锄头、刺刀把他解决了。

为了争取最后机会套取敌特情报，我严厉地审问其中一个敌特，要他立即交代问题。其间，他听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惨叫后，已经全身发抖，无法言语。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脸上掴了一巴掌。另一个敌特随着也狂叫起来，乱奔乱窜摔倒地上。郑伟灵继续如法炮制，把另外三个敌特也照样处死了。我虽首次看到这个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毫不动容，可见在敌我双方残酷的厮杀中，感情的色彩也跟着改变了。

事隔数十年后，我曾问郑伟灵，你一生杀过多少敌人？他说：百多个啦。原来，他还曾用日本军刀杀了六个敌特，但这是后话了。

读完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们过去那些描写战争的小说和电影，是多么虚伪和虚假。这篇文章的作者，许多南方的文坛朋友都认识，他到了晚年，是一个慈祥的爷爷，是一个关心下属的领导，口碑很好。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郑伟灵，也不会是凶神恶煞模样，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但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吗？那个杀了一百多人的郑伟灵，肯定是得过无数奖章的英雄，但我们能说他不“悲悯”吗？可见，悲悯，是有条件的；悲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书生的臆想。

一味强调长篇之长，很容易招致现成的反驳，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契诃夫、博尔赫斯，都是现成的例子。我当然不否认上列作家都是优秀的或者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上述这些作家的煌煌巨作里所具有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浩瀚

景象，这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有关，与印刷与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也与那些盗版影碟有关。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而从盗版影碟中攫取创作资源，大概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也许是精致的小玩艺儿。也许会有人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长的小说谁人要看？其实，要看的人，再长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长，不是影响那些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当然，好是长的前提，只有长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脚布一样，当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绣着《清明上河图》那样精美图案的锦缎，长就是好了。

长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气，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灯心草，不是纸老虎；长是真家伙，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长，是必须这样长的长。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

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

密集的事件当然不是事件的简单罗列，当然不是流水帐。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这样的长篇小说同样适用。

密集的人物当然不是沙丁鱼罐头式的密集，而是依然要个个鲜活、人人不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应该能够进入文学人物的画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为了解决作家的叙述困难而拉来凑数的道具。

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思想，只有所谓的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在善与恶之间，

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也可以说，具有密度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误读的小说。这里的误读当然是针对着作家的主观意图而言。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得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点脑子的，总是要比阅读那些轻软滑溜的小说来得痛苦和艰难。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可以平铺直叙，这是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习惯写法。这也是一种颇为省事的写法。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方言土语自然是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局限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

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它排斥投机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没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献媚和撒娇。

在当今这个时代，读者多追流俗，不愿动脑子。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

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8

第三章

75

第四章

112

第五章

157

第六章

184

第七章

216

第八章

257

第九章

292

第十章

310

酒后絮语——代后记

337

第一章

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搭乘一辆拉煤的解放牌卡车到市郊的罗山煤矿进行一项特别调查。沿途，由于激烈思索，脑袋膨胀，那顶本来晃晃荡荡的五十八号咖啡色鸭舌帽竟紧紧地箍住了头颅。他很不舒服，把帽子揪下来，看到帽圈上沾着透亮的汗珠，嗅到帽子里散出来的热烘烘的油腻气味里混合着另外一种生冷气味。这气味很陌生，使他轻微恶心。他抬起手，捏住了喉头。

临近煤矿时，黑色的路面坑坑洼洼，疾驰的卡车不得不把速度放慢。车底的弹簧板嘎嘎吱吱地怪叫着；头不断地碰到驾驶楼的顶棚。听到司机骂道路，骂人；粗俗的语言出自一个比较秀丽的少妇之口，产生黑色的幽默。禁不住看了一下她。她穿着一套蓝帆布工作服，

粉红衬衣的领子高高地钻出来，护着一段白脖子；双眼黑里透绿，头发很短，很粗，很黑，很亮。戴着白手套的手攥着方向盘，夸张地打着方向，躲避着陷坑。往左打方向时她的嘴角往左歪；向右打方向时她向右歪嘴角。她的嘴左右扭动着，鼻子上有汗，还有皱纹。他从短促的额头、坚硬的下巴、丰厚的嘴唇上判断她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在激烈的摇摆中他们的身体不经意地接触着，虽然隔着衣服但他饥饿的皮肤依然亲切地感觉到了她的温暖柔软的身体。他感到自己很想亲近这个女人，手发痒，想摸她。对于一个四十八岁的老牌侦察员来说，这感觉有些荒唐，但似乎又很正常。他摇了摇硕大的头颅，把目光从女人脸上移开。

路越来越糟，卡车从一个陷坑跌入另一个陷坑，颠簸簸簸，咯咯吱吱，像一头即将散架的巨兽一样爬行着，终于接在了一大队车辆的尾巴上。她松了脚，熄了火，摘下手套，抽打着方向盘，很不友好地看着他，说：

“妈的，幸亏肚里没孩子！”

他怔了怔，讨好地说：

“要是有孩子就颠出来了！”

“我可舍不得把他颠出来，”她严肃地说，“一个孩子两千块呢。”

说完这句话，她盯住他的脸，眼睛里流溢出似乎是挑衅的神情，但她的全部姿态，又好像在期待着他的回答。丁钩儿惊喜而好奇，几句粗俗对话后，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像一只生满蓝色幼芽的土豆一样，滴溜溜滚到她的筐里去。性的神秘和森严在朦朦胧胧中被迅速解除，两个人的距离突然变得很近。女司机的话里透漏出一些与他的此次行动有关的内容，他的心里生出一些疑虑和恐惧。他警觉地看着她。她的嘴又往边一咧。这一咧嘴令他极不舒服，刚开始他还感

到这个女人大胆泼辣，不落俗套，但她的随便咧嘴引起了他的不快，他马上就感到这个女人无聊而浅薄，根本不值得自己费神思。于是他问：

“你怀孕了吗？”

所有的过渡性语言都被抛弃，好像有些夹生，但她吞下去夹生，用近乎无耻的口吻说：

“我有毛病，盐碱地。”

“尽管肩负重任，但一个够腕的侦察员是不会把女人与重任对立起来的”，他突然想起了同行们嘲弄自己的一句名言：“丁钩儿用鸡巴破案”。想放纵一下的念头像虫子一样咬着他的心。他从口袋里摸出小酒壶，拔掉软木塞子，喝了一大口，然后他把酒壶递给女司机，挑逗地说：

“我是农艺师，善于改良土壤。”

女司机用手掌敲打着电喇叭的按钮，汽车发出低沉柔和的鸣叫，前边，黄河牌载重卡车的驾驶员从驾驶室里跳下来，站在路边，恼怒地看着她，嘴里嘟哝着：

“按你妈个球！”

她抓过丁钩儿的酒壶，先用鼻子嗅嗅，仿佛在鉴定酒的质量，然后仰起脖子，咕嘟嘟，喝了个底朝天。丁钩儿本想夸奖一下她的酒量，转念一想，在酒国市夸人酒量近乎无聊，便把话咽下去。他擦擦自己的嘴唇，紧盯着她厚厚的、被酒浸得湿漉漉的、紫红色的嘴唇，毫不客气地说：

“我想吻吻你。”

女司机突然涨红了脸，用吵架一样的高嗓门吼道：

“我他妈的吻吻你！”

丁钩儿大吃一惊，眼睛搜索着车外，黄河车驾驶员已经爬进驾驶室，无人注意他们的对话。他看到，在解放卡车的前面，是长龙一般的车队；在解放卡车的后边，又接上了一辆毛驴车和一辆挂斗卡车。毛驴的平坦额头上缀着一朵崭新的红缨，宛如暗夜中的一束火苗。路两边是几株遍体畸瘤的矮树和生满野草杂花的路沟，树叶和草茎上，都沾着黑色的粉末。路沟两边，是深秋的枯燥的田野，黄色和灰色的庄稼秸秆在似有似无的秋风中肃立着，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时间已是半上午。高大的研石山耸立在矿区中，山上冒着焦黄的烟雾。矿井口的卷扬机无声无息地转动着，有几分神秘，有几分古怪。他只能看到卷扬机轮的一半，余下的一半被黄河车挡住了。

她连续喊着“我他妈的吻吻你”，身体却凝固般不动。丁钩儿起初被她吓得够戗，但很快便忍不住地笑起来。他用食指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胸脯，就像戳了机器的启动电钮一样，她的身体压过来，冰凉的小手捧住他的头，嘴唇凑到了他嘴上。她的唇凉飕飕的，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弹性，异常怪诞，如同一块败絮。他感到乏味、无趣，便把她推开。她却像一只凶猛的小豹子一样，不断地扑上来，嘴里嘟哝着：

“我操你二哥，我日你大爷……”

丁钩儿手忙脚乱，招架不迭，最后不得不采用了对付罪犯的手段，才使她老实下来。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坐着。丁钩儿紧紧地攥住她的手腕，不断地把她的反抗压制下去。她憋着劲反抗时，身体扭曲，时而如弹簧，时而如钢板，嘴里还发出哞哞的叫声，宛若一头顶架的小母牛。丁钩儿忍不住笑起来。

她突然问：

“你笑什么？”

丁钩儿松开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说：

“姑娘，我要走了，想我了就按名片上的地址去找我！”

女司机打量着他，又低头看看名片，然后重新打量他的脸，好像一个目光锐利的边防检查员在检查一位过境旅客的护照。

丁钩儿伸出一根指头，弹了一下女司机的鼻子，然后挟起皮包，一只手转动了开车门的把手。他说：

“小姐，再见了，我有上等的肥田粉，专门改良盐碱地。”

他半个身子挤出车门时，女司机一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角。

他发现了她眼里流露出来一种可怜巴巴的神情，忽然觉得她年龄好像很小，没结婚也没被男人动过，很可爱又很可怜。他摸了一下她的手背，非常认真地说：“姑娘，我是你叔叔。”

她恼怒地说：

“你骗人。搭车时你说是车辆监理站的。”

他笑道：

“不是差不多吗？”

她说：

“你是特务！”

他说：

“可以算特务。”

她说：

“早知你是特务我才不拉你呢！”

丁钩儿摸出一盒烟，扔到她怀里，说：

“好了，别生气啦。”

她把他的小酒瓶扔到路沟里，说：

“用这样的小瓶喝酒，算什么男人。”